

国图所存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

张廷银

近现代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陈垣(1880-1971)先生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渊源颇深。他曾于1921年底至1913年5月和1928年至1929年间,先后两次职掌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去世后,他的数千种藏书辗转归入国家图书馆,成为服务于国家文化事业的珍贵典藏。陈垣先生藏书重于实用,因此,其所藏之书基本上为所阅读之书,留存于藏书上的珍贵批校、题跋,反映了他的艰辛学术历程。他又广交时贤,乐于助学,领袖群伦,与许多学者建立了十分融洽的关系,其藏书中有不少即来自同道故友、晚学弟子的呈赠,这部分书籍以及其中的题赠,不仅反映了他与题赠者的学术交谊,也能体现他的学术思想与方法。笔者兹据读书所见,结合相关材料,对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做一初步的介绍。

一、显示陈垣先生读书治学之迹的批校本

陈垣先生为读书研究而收书、藏书,因此,几经其手之书,大都经其阅读。其中相当一些则是他仔细阅读、认真批注过的。从留存于眉端行间的批注校正,我们可以了解他当年孜孜治学的真实过程,也可以看到他对于相关学术问题的真知灼见。

由于我们目前无法准确掌握陈垣先生批注的书籍种类和具体书名,因此,他曾经专门进行研究和有所引用的书籍,则是我们了解其批注情况的重要线索。根据这一线索,经过初步调查,目前所知陈垣批校书籍约有80余种(部)。其中批注文字最多、最重要的有《南史》、《元和姓纂》、《廿二史札记》、《九史同姓名略》、《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十七史商榷》、《新元史》、《碑传集补》、《疑年录》、《天一阁书目》、《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嘉兴藏目录》、《藏书纪事诗》、《册府元龟》、《宋元学案》、《日知录续补正》、《景教碑文纪事考正》、《景教碑文注释》等。就批校的条目及字数来说,似乎并没有特别之处。然而,正如王树民先生所说“数量虽微,然皆精审无可易也”^①,陈垣先生的

^①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前言”,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

这些批注处处显示着一个专业学者的读书过程，而不仅仅是一般藏书家的版本校勘。兹以陈垣先生批注最多之几部为例，做一说明。

《元和姓纂》是中国第一部姓氏专著，陈垣先生对这部姓氏著作也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在其所藏光绪六年（1880）金陵书局刻本《元和姓纂》上，作出了多处批注。如卷二“徐”下之“高平”条，朱笔眉批：“‘山阳县’三字，库本连上，‘令’作‘今’。”“瑕邱”条，批道：“‘邱’，库本均作‘丘’。”卷九“奋”下“河南”条，批道：“今《官氏志》无此文，而《隋书》六五则有《吐万绪传》。《北史》七八。”从形式上看，似乎与一般的文字校勘无甚区别，但陈垣先生校勘之意非仅在于指出彼此之文字异同，其实还有很深刻的学术意义。在卷前署名孙星衍的《校补元和姓纂辑本序》结尾处，陈垣先生批道：“此本从四库本出，有极浅显之凭据：1、六卷廿八页九行后及廿九页八行后，均脱去库本之半页；2、七卷三页背八行‘陇西’二字库本原到脚，‘天水’二字另行，今误连，又衍‘郡’字；3、八卷十七页第一行‘郎中’二字，库本原到脚，‘库成’二字另行，今误连。惟此本‘玄’改‘元’，‘胤’改‘允’，‘丘’改‘邱’，‘弘’独不改‘宏’，与库本异。”可以看出，全书的批注其实都是“此本从四库本出”这一结论的根据和基础。而要达到这一结论，没有很全面的知识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则是很难实现的。陈垣先生的这些批校，后来都被岑仲勉吸收到他的《元和姓纂四校记》^①中。

在《宋元学案》总目录之每卷上分别注出所指涉的人物，如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下，写：“朱熹”。卷首处之眉批则主要是列出每段文字所说的人物。如关于卷四十七一段，批：“陆子静家塾名槐堂，后人因建槐堂书院，在金溪县学东。”正文之批注，或指出引文之出处，如卷四“文穆蒋颖叔之奇”一段注解中“谢山为文穆端研记云”句，眉批：“谢山此语出《容斋四集》卷九。”卷五十“张忠恕……”一段后全祖望谨案“而不免有阿附史氏之诮”之语，眉批：“此指朱在，见四九，又见《鮑埼亭外编》十六《石坡书院记》。”有时指出此处记载与彼处之异，如卷二十五“杨时”小传，眉批：“《宋史》四二六《儒林传》与此不尽同。”有时指出文字记载之误，如卷五十一“吕祖泰……文靖公夷简五世孙”几句，眉批：“应作六世孙，《宋史》四五五《忠义传》附《祖俭传》作五世，误。”从文字到内容，从人物到史实，多方考证，彼此对照，这体现的是学者的孜孜探究精神和对相关知识的娴熟掌驭。

赵翼《廿二史札记》是陈垣先生反复阅读的书籍，除了王树民先生《廿二史札记校证》所引陈垣校注外，另外一部上也有不少他的重要批注。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条“安受其节而不发兵”句，眉批：“因其受太子节而弃市，非因其不发兵而弃市，故‘不发兵句’可删，见《汉书》六六《刘屈氂》传。”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此尤曲笔之甚者矣”句眉批：“苟列传有其事，则又以为

^①中华书局，1994年。

矛盾矣。”“街亭之败，亦不书”句后，眉批：“为魏讳，为蜀讳，盖各据本史。”卷六“裴松之三国注”条“所引书凡五十余种”眉批：“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亦列举裴注书目，见《湖海文传》廿五。”“袁晔《献帝春秋》，孙思光《献帝春秋》”句眉批：“《吴志》十二《陆瑁传》注云，袁迪孙晔，字思光，作《献帝春秋》。此云袁晔，又重出孙思光，误。”卷八“晋书所记怪异”条“因此作《搜神记》”眉批：“《搜神记》无此事。”卷十三“魏书多曲笔”条“亦似略无忌讳”句眉批：“非无忌讳，乃不以再嫁为嫌也。”卷二十七“辽史二”条“《宋史·宋琪传》琪本幽蓟人……太子德光南侵”几句眉批：“原文‘太子’二字属下指东丹也，今指德光，误，若属上自在亦误。”

乾隆版《册府元龟》是陈垣先生藏书中部头较大的一部，有320册，但此书同时也是他批注最大的一部。陈垣先生将该本与宋本对勘，仔细辨析了其于宋本之区别，并据之在眉端指出具体的情形，在行间用朱笔补写了遗漏的内容。如卷五百一十七关于“旧勋加冠”，墨笔眉批：“‘勋旧’下尚有五十八字，见三韩本卷卅一，‘奉先门’十六页。‘加冠’一段为《南齐书》卷九《礼志》，文见殿本卅二页，九行。又‘加冠’至十七行‘军容’，系卷五七七‘奏议门’九页十四行。‘百徒’下脱文错简于此。”卷四百七十四“台省部”中“九年三月……授威循王”一段，在“授威循王”前朱笔添写“到京详知其事南省会议众言可徵，理宜有归，事岂惮改，因追”等字。类似的批注在书中有数百条之多。

元朝历史是陈垣先生毕生从事的研究课题，其著名的“四校法”即来自他校勘《元典章》的实践经验。而且他不但孜孜研读《旧元史》等古人作品，对于近人之研究著作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比如柯劭忞《新元史》一书，陈垣先生就不仅指出其讹误，还从史实考证、结构体例等方面提出善意的净言。“目录”“列传第四十八”“也里迭儿”，眉批：“卷廿九《氏族表》，依欧阳《圭斋集》卷九作‘也黑迭儿’。”“目录”“文苑上”“陈刚中”，眉批：“据《旧史》及《元史类稿》，作杨刚中。”卷二十九“表第三”“丑闻”，批：“钱氏表引《元统元年进士录》皆著其字，如余阙字廷心、丑闻字时中是也，此何以删去。”卷二十九“表第三”“也黑迭儿”，批：“卷一五一列传及目录均作也里迭儿，误。”卷二十九“表第三”“别罗沙”，批：“前后引《元统元年进士录》皆去其字，别罗沙独存其字，何也？体例太不画一。”卷二十九“表第三”“也里可温氏亦回回人”，批：“也里可温非回回人。”卷二十九“表第三”“马世德”，批：“马世德为马祖常之季父，见马氏世谱。”卷二十九“表第三”“塔海”，批：“下页言塔海字仲良，此又以仲良与塔海并列，何也？下页有迺贤，此又出之，何也？”卷二十九“表第三”“阿尼哥”，批：“列传误作阿尼哥尼，此不误。”

景教是陈垣先生多年关注的问题，有关景教的著作当然是他仔细阅读的书籍。《景教碑文纪事考正》上之批注即为其显证。如卷一“景教流行中国碑”，眉批：“碑连目卅二行，行六十二字。”碑文中“无元真主阿罗诃欤”一语，眉批：“《翻译名义集》卷一，阿罗诃秦云应供，大论云变应一切天地众生供

养。”“判十字以定四方”一语,行间旁批曰:“据此则先有十字,乃有耶稣。”“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几句,眉批:“假定阿罗本来将廿岁,至武后初年亦已七十矣。”行间旁注:“事实。”“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行间旁批:“此诏见《唐会要》卷四十九。”在《录钱氏景教考》“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旁批:“语出《旧唐·波斯传》。”《录道古堂文集论景教碑事》,旁批:“卷廿五”,题下又注:“专论回回,可谓文不对题矣。”“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两句,眉批曰:“此又摩尼为回回。”《录金石萃编论景教碑事》之“大秦一名如德亚”语,眉批:“此以犹太为大秦。”“然无一语及景教入中国之事”一语,眉批:“诚然,诚然,奇极,奇极。”诸如此类的批注有数百条,可见陈垣先生对此问题关注之深和考察之细。

上引几例说明,陈垣先生对古今学术著作的批读,无一不与其学术兴趣或研究题目相联系,无一不关乎重大的学术论题。这些批读中的一部分可以被我们所认知,而其中的绝大部分,若非该专业领域的专门学者,已经非常不易理解了,或者即使理解其文面意义,亦难知其学术意义。所以,象王树民先生那样,把这些批注撮录整理出来,提供给有关的学者,是非常必要的。已故学者牟润孙就曾说过:“先师读书有所见必加眉批于其上。……他所常读的书有眉批的归了何处?至今我也未能问明白。……至于他所批的书,更应由公家集中保管,找专人整理,看看有无抄录在一起,编为笔记公之于世的必要。”^①从上面所引述的几条就可以看出,撮录整理陈垣先生的批注是很有必要的,然而,牟润孙先生所关心的陈垣先生手批之书的归宿虽然已经明确,但要准确全面地掌握其数目、具体书名以及批注内容,进而展示陈垣先生的重要学术见解,则的确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二、见证陈垣先生学术交往情形的题赠本

陈垣先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和史学家,因此,与其交往的人中即有多人亦为成就突出的学者和教育者。他们经常将自己的著作呈送陈垣先生进行交流或请益,从而构成了陈垣先生藏书中的题赠本。这些呈赠本上有的留有著作者的题赠语,有些甚至没有留下呈赠者的任何字迹,但我们都可以从中体会到浓浓的君子交情,有些则反映了他们切磋学术的过程,表达了某种学术见解。

可以确定是著者或藏书者呈赠给陈垣先生的书上,一般都有呈赠者的赠语,如《秦妇吟校笺》扉页处有陈寅恪题“敬求教正,寅恪”。《民治私议》首页有作者马相伯所题“马相伯呈授庵校长校正”等字。《双剑謄殷契骈枝三编》书衣上有作者于省吾的赠语:“援菴先生指正。”《更生记》上有作者冼玉清“援庵先生教正”的赠语,《清代的几个思想家》上有“援庵师教正,学生肇祖

^①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第75页。

敬呈”的作者赠语。闾铎《闾氏故实》虽然未有题赠语,但在书衣上却钤捺了“呈”“政”两个铅印字,显然也是特意敬呈陈垣先生收存的。

陈垣晚年回忆,他在旧时代找资料主要是三个来源:自己的藏书、朋友的藏书和图书馆的藏书^①。有些了解陈垣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的学者,常常也把自己拥有的相关书籍转致陈垣先生。闾铎曾致函陈垣说:“侧闻理董四库,搜集故实,甚盛甚盛。有壬子书目,虽系坊刻,却似博雅,谨以奉尘。”^②傅增湘也致信告诉研究元史的陈垣:“前月在南京书肆见有写本《元秘史略》,匆匆不及细览,旋即函属寄来。”^③而陈垣所藏的《异号类编》书套上就题写:“援庵夫子鉴存,乙酉冬日受业史树青谨呈。”史树青是陈垣先生辅仁大学的学生,与陈垣先生多年来往,当然了解老师从事研究的资料需求。这本《异号类编》无论是他原藏还是现购,都体现了其对老师学术研究的真诚襄助。这里尤其需要特别介绍容肇祖致赠陈垣先生《香山县志》的情形。

国家图书馆所存陈垣原藏《香山县志》的扉页处,有赠者容肇祖之题记一则:

黄慈博先生赠与此书,惟缺首本,赖氏族一志未缺,特寄上。肇祖已托中山县友人搜觅此书,他日得之,当将首本寄上补完也。寄呈援庵师惠存。学生肇祖上。十月八日

容肇祖与陈垣先生有同乡之谊,在学生时代颇得陈垣之教导和提携。陈垣先生曾经以“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④来激励容肇祖,容肇祖也认为广东学者中陈献章的理学近于拘,梁启超的新学近于浅,都不及陈垣的朴学“沉实精密之不可移易”^⑤。不过,这则题赠不仅反映了二人的深厚情谊,也体现了他们对方志和乡邦文献的珍重。容肇祖在撰写《孔尚任年谱》时,欲从方志中寻找孔尚任的确切卒年,便于1933年8月26日致函陈垣求援:“闻有新修之《山东通志》,又知先生藏有山东县志多种,《曲阜县志》此间不可得见,如值记室之便,钞示孔尚任传如何?”陈垣先生则给他指出了《兖州府志》续编中孔尚任的卒年记载。容肇祖得到这个答案后,继续十分迫切地请求:“《兖州府志》续编有卒年七十一条,尤为肇祖所急欲知者。”看来,二人对方志的价值都是非常倚重的。至于容肇祖特意呈赠陈垣《香山县志》,则起因于陈垣之所托。1933年8月26日容肇祖致陈垣函中云:“前先生属为代觅《香山续志》,经托中山人回乡觅之,惟久未得复,大约需假以时日也。代借之《香山续志》,因借自中大,肇祖已离中大职,不便过于久借,如属缮录,尚幸督促记室早日成之,

①健行:《利用图书馆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陈垣老人访问记》,《图书馆》(北京)1961年第3期,第17页。

②《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页。

③《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8页。

④1933年9月24日容肇祖致陈垣函所引,《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70页。

⑤1933年9月24日容肇祖致陈垣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70页。

以便缴还耳。”看来此时他已为陈先生从中山大学借到了《香山续志》，正在想法为他寻购此书。为了使寻购的结果更有把握，容肇祖也动员了广东香山学者黄慈博，并在致陈垣函中予以交代：“《香山县志》前托觅之香山人已付之浮沉，经再托黄慈博先生，据云商之友人，有重复可让出者，迟数日或可交来云云。如觅得时，当即邮寄上也。”又过了差不多两个月即1933年11月18日，容肇祖再致信陈垣说：“《元典章校补释例》，当以一册代赠黄慈博先生。肇祖前曾以《滇云历年传》一部，酬其赠《香山续志》之谊。”^①所以说，这部尚不完整的《香山续志》实际上凝结了三位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人际交往，体现了学者之间以书会友的浓烈之情和淡雅之致。

陈垣不仅与学者交往，也与政治活动家来往，比如与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就有过数次交往。陈垣在广东读书和办报期间，深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据广州《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记载，1912年8月，陈垣曾一度参加同盟会，并任广东支部评议员。在思想上则拥护孙中山的反满排清主张，并因此受到当局的迫害，1901年21岁在广州参加府试，广州知府施典章主持府试，对陈垣一二试文章的思想倾向很不满意，在试卷上批曰：“直类孙汶（文）之徒。”后来又将在孙汶二字圈掉，改为‘狂妄’。”^②1912年5月陈垣还与广东医学共进会的同仁欢迎孙中山并合影留念。陈垣先生如此敬重孙中山，孙中山也表现出同样的情谊。在陈垣先生收藏的孙中山所著《会议通则》封面，即题有“陈援庵先生惠览，孙文敬赠”等字。

陈垣先生所接受著者之赠书，有一部分毫无疑问只是一般的情谊往来和文化交流，这些书籍自然无须精读和通读，而有些书他则是必须要读和仔细阅读的，上面留下了阅读时的许多认真批注。在孙中山所著《孙文学说》上，虽然未见孙中山的题赠，因而不知是作者赠阅、陈垣自购还是他人所赠，但其中有多处陈垣先生的圈点和读批，如第二章“以用钱为证”中“则经济革命之风潮因之大作矣”，即用朱笔改“经济”为“社会”。1963年6月12日陈垣曾复函张舜徽说：“大著《广校雠略》拜读一过，获益良多，博极群书，尤所佩服。……大著美矣，然词锋太利，时或伤人，试为拈出，略分四项。”所列四项为：骂尽一切；轻视后世；指名相讥；自视过高，看不起人^③。看来，陈垣先生不仅仔细地读过张氏所著，还非常负责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四个关乎学术素养的问题，更见得陈垣先生之率直和卓见。在国家图书馆收存、原为张舜徽所赠陈垣先生的《广校雠略》上，虽然看不到陈垣先生所列四个问题的批注，却有他对于原书文字的一百多处朱笔校改，如：“著述体例论十篇”“论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之“孔子立人道之极，末可谓立儒道之极”句，改“末”为

①《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72页。

②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③《陈垣书信底稿》，《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813页。

“未；”“论太史公书为编述之正体”中“莫不代奇辞以浅语，古文为今字”句，“古文”前朱笔添加“易”，“悉符于雅训而未赏呈臆见”句，朱笔改“赏”为“尝”。这些改动基本与书后所附“刊误表”一致，因此也是代表了作者本来的意思。但“著书标题论八篇”之“论经传篇题多经后人增损”中“公羊传卷首标题云春公羊解诂”，朱笔添加为“公羊传卷首标题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此处改动在书后所附“刊误表”中则并未标出，显系陈垣自己所批。如此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精准的修正，对著者无疑是最高尊重。当然也反映了陈垣先生与著者之间的亲密学术关系。

陈垣先生与各层次的学者真挚而友善地进行学术交流，学者们同样表现出对他的无限信任与坦率。在国家图书馆所存、著者王祖彝呈赠陈垣先生的《中华民国疆域沿革录》中，夹有一纸王祖彝所致陈垣先生的赠书题语：

昨呈拙著《疆域沿革录》，顷又发现错误两处，俱在序中：一为少文卧游，误为宗懔；一为顾祖禹著《方舆纪要》，误为亭林。当时未及深思，率然属稿，致成大错，可笑也。敬乞代予改正，免为识者所讥。幸甚，幸甚。专此，敬候援庵先生刻祺。王祖彝谨启。

王祖彝请陈垣先生代为改正其书中之讹，这既反映了他对陈垣的尊重，同时也说明在王祖彝的眼里，陈垣先生具备为他人著作改错的胸襟和识见。

国家图书馆所存陈垣藏书，有一本现代方志学家朱士嘉（1905—1989）所编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在该书书名页，有一则朱士嘉先生1963年8月10日给陈垣先生的赠书题记：

援庵老师早在三十年前就对同学们指出索引工作能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意义。嘉能勉成此书，实与老师的教导分不开的。举以奉赠，聊表谢忱，并请指正！

学生 朱士嘉敬赠

《宋元方志传记索引》是朱士嘉先生所编关于三十三种宋元方志中传记人物的索引，问世以来，深受广大学者之欢迎。书甫出版，朱士嘉就恭呈陈垣先生，这首先反映了他对陈垣先生的崇敬之情，而他在赠书题记中特别指出陈垣先生当年的教导，则体现了对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无限推崇。朱士嘉所说三十年前陈垣先生有关索引工作的教导，我们可以从1928年8月20日顾敦铎致陈垣函得到证实，其中云：“目录索引之学，实为整理国故必要之工具，吾师提倡已久。”^①另据《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记载：1956年1月6日，陈垣先生到东厂胡同1号历史研究所三所参加历史考古学科发展规划会议。“陈垣在会上提出要加强索引等工具书的编制。他说，我校《旧五代史》时，自己找人做《册府元龟》的资料索引，我不想用《永乐大典》，以前这种事情都要自己做，现在可以发动大家来做。以前刘申叔做学问，材料用得好，他比我大一点，

^①《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62页。

我想他为何能如此,原来他家有《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索引,是他家几代相传,父子祖孙自己用,不传外人。有不少索引,像《左传》人名、地名索引,都是日本人编的,以前编工具书,是‘智者不为’,今后要改变这种风气。”^①以此例彼,朱士嘉所说应不为虚,陈垣先生对索引工作之重视也可见一斑。

三、以学者眼光看待图书馆及其典籍

陈垣先生曾说:“我不是藏书家,不重藏宋元等版本;也无力购买,只藏我阅读、实用的书籍。”^②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亦谓:“君藏书数万卷,非切用者不收。”^③但尽管如此,他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为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他曾花费七百多元购买必要的图书资料,为此颇为感慨地说:“我们这些经济条件很差的穷秀才负担,的确是很困难的。”“解放前做研究工作真是难关重重,图书资料就是一道难关。”^④所以,陈垣先生始终倚重图书馆的作用,也非常强调图书馆在典守之上的资料服务功能。

当年北平图书馆请示陈垣先生是否购买山东寿县出土的古器物,陈垣先生明确表示:“本馆经费并不充裕,且系图书馆,非兼办古物馆。”^⑤古器物相对于图书,博物价值多于实用价值,而且耗资甚钜,为使用计,图书馆当然要首先考虑购买图书而不是古物。也许今天可能有人会为当年未购买这批古器物而感到遗憾,但我们觉得陈垣先生的决定恰好是保持图书馆地位的明智之见。不仅如此,陈垣先生还特别强调图书资料的使用价值,他晚年曾对前去专访的北京图书馆李希泌先生说:“在图书馆内,图书的保管与利用应有很好的结合,过分强调保管,会使很多有用的图书资料不能为专家学者所利用。”^⑥不过,陈垣先生对我们今天的启示不仅仅是他对图书馆的学术要求和他对图书馆的最优化利用,他一生中与图书馆所建立的协作、互助的友好关系,同样值得今天的图书馆和学者们共同学习。

陈垣先生与图书馆之间的最早因缘其实还不是他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而是率先清点《四库全书》。191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从热河移入京师图书馆。陈垣先生就开始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并最终编制了《文津阁册数页数表》。当时,京师图书馆工作人员不知道四库馆最初编制的目录与成书的《四库全书》有目无书或有书无目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于是经常出现找不到书的现象,而且如此大部头的丛书如果不熟悉其排架,即使有书也难以很快找到。陈垣先生则在此前就调查过文渊阁《四库全书》,并绘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排

①刘乃和《日记手稿》,《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682页。

②刘乃和:《陈垣与北京图书馆》,《励耘承学录》第104页。

③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1页。

④健行:《利用图书馆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陈垣老人访问记》,第17页。

⑤陈垣致北平图书馆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0页。

⑥健行:《利用图书馆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陈垣老人访问记》,第18页。

架图》。根据这个排架图,他自然十分了解每一部书的具体位置。陈垣先生回忆说,有一次他写了一张有书无目的借书条给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实在找不到,就称无此书,而陈垣先生根据自己对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调查,确定必有此书,最后管理人员让陈垣先生自己进库去找,很快就找到了^①。看来,对于有些藏书,读者熟悉的程度还要高于图书管理人员。因此,图书馆决不能把读者仅仅理解为片面索取者,他们对于图书馆其实也经常发挥想象不到的服务作用。

陈垣先生根据其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调查和研究而编制的《文津阁册数页数表》,“提挈纲领,使观者若登泰山俯培楼,足虽未践,已历历在目”^②,成了迄今为止惟一对《四库全书》册页数的全面统计。而他自己在研究元代历史过程中,所编写的《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元六十家文集目录》,对于其他读者也非常有用,于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赵万里先生商得陈垣先生的同意,抄录一部弄藏馆中^③。1956年3月16日,陈垣先生复函朱师辙云:“奉二月廿八日书,知欲于《清史述闻》后附印拙编《清史稿列传检目》,征询同意。本人编此,原为自用,并未预备印行,三十年来,索抄者众,恐有错误,亦不敢轻以示人,仅北京图书馆抄去一部。尊处何年抄得,竟尔忘记,今若认为可以付印,以免大家重编之劳,我不反对。”^④陈垣先生一直没有主动发表和出版自己所编写的《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元六十家文集目录》和《清史稿列传检目》,亦未轻允他人抄录,但却同意北京图书馆录副弄藏,就是希望能对学者研究有用。因为他自己出于实用而编制两书并有实际的运用,他一定清楚其中虽然还有不完善之处,但绝对有用,因而应该付诸公用。

陈垣先生曾经说,他和北平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李耀南,由最初的争吵后来变成了好朋友^⑤。当初的争吵或许曾令他十分恼火,但最终的结局显然亦令他倍感惬意。这就是真正的学者情怀,也是学者希望与图书馆所达成的和谐关系。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①李希泌:《陈垣与〈四库全书〉》,《健行斋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01页。

②黄元蔚致陈垣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9页。

③刘乃和:《陈垣与北京图书馆》,《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

④《陈垣书信底稿》,《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683页。

⑤健行:《利用图书馆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陈垣老人访问记》,第17页。